

今日关注

如何让先进立法成为打开铁笼的钥匙

□晚报评论员 李记

据7月11日《新京报》报道:重度精神疾病可以让一个人突然变得可怖而陌生,在记者的采访中,无奈的亲人只能把患者关到自制的铁笼,或是请求警察把他关进监狱,又或是把他“遗弃”在精神病院。

这是一则让人读来倍感讶异和心惊的新闻。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的数据显示,中国重度精神病患者人数超过1600万,也就是说不到100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是重度精神病人。而这个群体的救助方却显得“弱小”,我国注册精神科医师只有2.05万人,护士3万人,医患比例高达1:84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和心理压力。救助所依赖的医疗基础设施,也显得“单薄”。即使在医疗条件领先的北京,精神病专科医院回龙观医院,等上一张病床往往要数月乃至半年的时间。

报道称,这样的“笼中人”,仅河北省便有约10万人。而全国约有1600万重症精神病人,其中10%有潜在暴力倾向,很大比例的重症病人成了“笼中人”。1600万人,这不仅是个庞大的数字,更是一个个本不该如此残酷的人生;1600万人遭遇这般冰冷的现实,显然不是一纸法律便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报道所称,尽管今年5月1日起,被称为国际接轨、获得广泛好评的《精神卫生法》正式施行,但因经济条件限制,家庭关爱不够,村落、社区对精神病人认知恐惧等原因,铁笼成为大量重症精神病人的最终“归宿”。

而没有记错的话,《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医疗机构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很显然,法律实施后,在和地方对接的过程中,先进的立法,遭遇的不仅是置若罔闻,更有各种各样不作的理由和借口。比如在报道中,重症精神病人家属的无奈、关爱不够与“不配合”,被相关人士反复提及。现实

问题还是,如果职能部门所有应该为重症精神病人免费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够满足期待并肩负起应有的责任,又怎么会有那么多“不配合”?

报道称,社区精神疾病康复机构匮乏,是全国共性问题,比如目前河北还没有一家社区康复机构。很显然,由点及面地建立起社区康复机构网络,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既然《精神卫生法》已经实施,各地职能部门主导的这项工作,就应该快速启动,而非继续无所作为、冷眼旁观下去。因为,如果说重症精神病人家属,把自己的亲人紧锁铁笼,是“我们能有什么办法”的无奈之举的话,那么,打开所有被锁精神病人铁笼的“钥匙”,除了“与国际接轨”的《精神卫生法》,更应有各级各地积极创造条件、促使法律更好落地的务实作为。

街谈巷议

靠红头文件卖水泥?

□邵俊国(江西)

3月7日,眉县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各部门、乡镇推广使用某品牌水泥,并将销量纳入年度考核中。眉县人社局还联合房企,宣传农民进城购房的五大优惠政策,农民购房大中专以上子女安排就业。记者多次向眉县宣传部求证时,得知“水泥的事情曝光后,各个单位都开会了,要求不能乱说”。

(7月11日《每日经济新闻》)



事实上,红头文件卖水泥并非个例,近年来各地出现不少类似情况,有的内容让人啼笑皆非。诸如,某市要求市直机关和各乡镇、农场必须喝某品牌酒,且规定了每年的喝酒目标;某市向现任干部分配商品房销售任

务;某县要求干部职工用公款赴当地一景点参观旅游,且规定团次、人数、费用……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都应当靠自身实力和信誉竞争。然而,当地政府非要插上一杠子,以

行政权力破坏公平竞争局面,这种做法让人匪夷所思。如果说是为企业排忧解难,在税收、贷款等方面给予适当优惠倒还可以理解,但无视国家法律法规,以公权力为个别企业大开方便之门,将不可避免地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政府公信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杜绝荒唐的红头文件,必须对重要签发人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进行约束,也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当下,在不少地方民主集中制的贯彻落实实质走样,有些单位和部门过分强调集中而无视民主,搞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造成“一言堂”、“家长制”的局面,这样的“集中”显然违背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只有坚决贯彻落实各项制度,对违规红头文件的签发人进行问责和处罚,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媒体评说

人民日报网络背后的“群体智慧”

在美国举行的科技、娱乐和设计年会(TED)上,一位来自以色列的演讲者将一头公牛牵上台,要求台下观众猜测重量。500多名观众通过手机和网络参与了实验。其中最低的猜测是308英磅,最高的是8000多英磅,平均值是1792英磅,而这头牛的真实重量是1795英磅。这其实是一个古老的实验,其背后的理论被称为“群体智慧”。人们很早就注意到,在特定的机制下,看似杂乱无章的个体智慧得以聚合,偏见相互抵消,错误相互修正,最终呈现出惊人准确的平均答案,或是接近完美的智力产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兼听则明”,这些源自中国的古老哲理,在互联网时代得到了充分体现。

环球时报

信息越公开,期待也将水涨船高

政府信息公开已逐步推行多年,取得巨大成就。国务院最新提出的9个重点肯定会把这项历史性改革推向新的水平。然而需要看到,随着政府信息公开的推进,公众的要求也水涨船高,这种信息要求与提供能力之间的水平差近年来并未缓解。舆论竞争的主阵地实际上已经转向对过程的占领,换句话说,谁把握了对过程性信息的主导权,谁就掌握了舆论的方向。政府信息公开方兴未艾,这是中国改革的标志性内容,也是难点最多的“深水区”之一。这项改革的成效不能仅看信息公开的面有多宽,速度有多快,还要看改革的推进与舆论的期待能否相向而行,逐渐靠近,而不是彼此越来越远。

潇湘晨报

高温夺命的悲剧能不能避免

7月9日,湖南湘潭市岳塘区环卫工人工人贺桂华中暑身亡。她之死,距离长沙代班环卫工刘利华中暑身亡,中间只有短短半个多月时间。半个多月时间里,两座城市的两名环卫工先后因高温身亡。除了慨叹气候环境日趋恶劣之外,我们需要仔细地审视一番酷暑下的高温权益问题。说到权益,人们会下意识地想到高温补贴。不错,高温补贴是高温权益的一部分,但金钱的补贴并不是高温权益的全部内容。高温权益作为劳动权益的一种,其根本的目的是要保护劳动者在高温天气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当环卫工中暑身亡的悲剧接连发生之后,我们确实要问一问,法律规定的防暑降温措施是否真的落实到位了?

齐鲁晚报

不妨多做一些“笨活”和“慢活”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300多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比去年高出六成,一些热点城市半年卖地收入已接近去年全年。这些年,无论是持币观望的,还是已经沦为“房奴”的,都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房价其实是随着地价水涨船高。开发商有亏本“跑路”的,而地方政府都是稳赚不赔。这也是楼市调控在地方不断遇阻的主要原因。高昂的房价使农民进城步伐放慢了,使年轻人创业的勇气消失了,甚至拖累了经济的健康发展,种种恶果已经显现,将来可能还会更加严重。一些地方政府作为当局者,应该比旁观者更明白“土地财政”之路越走越难、越走越险,为什么还是乐此不疲?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已经没有耐心去做“慢工出细活”的工作了。

公民声音

药企行贿,打苍蝇更要堵漏洞

□张枫逸(河南)

日前,公安部统一组织指挥对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部分高管涉嫌严重经济犯罪依法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现已查明,作为大型跨国药企,近年来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华经营期间,采取直接行贿或赞助项目等形式,向个别政府部门官员、少数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7月11日《新华网》)

商务部提供的资料表明,在全国药品行业,作为商业贿赂的药品回扣,每年侵吞国有资产约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16%。行贿成为医药行业潜规则,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更直接助推了药品价格的虚高,加重了公众医疗负担。以中标价格为基准,药品生产研发成本仅占10%,而商业贿赂成本高达60%。

作为在华规模最大的跨国制药企业之一,葛兰素史克行贿被查,体现了我国严厉打击商业贿赂的坚定决心,起到了有力的震慑作用。据报道,受该事件影响,不少跨国药企已成“惊弓之鸟”,公司在华的合规问题成了他们的“紧箍咒”。不过,我们不可能指望某一个案的处理,就能起到惩前毖后的

作用,医药行业自此风清气正。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跨国药企在华行贿,说明我们的医药销售体系出了问题。倘若蛋的缝隙依然存在,即使打掉一两只苍蝇,马上还会有新的围拢过来。因此,打苍蝇更要堵漏洞,在查处药企行贿的同时,有关方面更要深刻反思,针对暴露出来的深层次制度根源查漏补缺。

漏洞一,惩处过轻。正如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指出,国内对于受贿行为的监管法律不比其他国外宽松,但具体到事实层面却形同虚设,致使国内医药行业行贿行为极为普遍。因涉嫌行贿和不正常营销,制药巨头西门子和辉瑞公司被德国美国开出13亿、23亿美元的天价罚单,反观国内,2011年浙江两家

药企行贿国家药监局官员,仅仅被法院判罚金10万元。违法的风险有多大,守法的意识才有多强。只有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大对药企行贿的惩处力度,才能有效减少行贿行为。

漏洞二,招标失范。按照我国现行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法,所有公立医疗机构使用的药品必须竞价采购。然而,由于缺乏阳光透明和有效监督,医生的话语权过大,医药招标制度实际上已经沦为某种程度上的回扣比拼,最终入围的不是药价最便宜的而是公关最到位的。遏制医药贿赂,就必须从消灭寻租空间入手。不妨效仿国外,引入保险公司等第三方介入,斩断寄生在药品上的利益纠葛,改变医疗系统“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状。

反腐倡廉

“王术君落马”提振网络反腐信心

□张培元(郑州)

记者从贵州省纪委获悉,安顺市市长王术君涉嫌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网上举报人陆炫杰也正在配合调查。此前,贵州台江县鑫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陆炫杰,实名举报王术君在担任贵州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主任及理事长时伙同他人受贿索贿,致使其企业陷入困境。(7月11日贵州金黔在线)

这是一起透明得近乎“直播”的网络反腐事件,其公开透明度之高、网络内外关注度之大,以及有关部门的反应速度和查处力度之非同寻常,在今后编撰网络反腐史时都可以浓墨重彩地留下一笔。

网络反腐到底是“好得很”,抑或“糟得很”,不同的人由于站位和视角不同,自然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尽管网络信息良莠不齐、核验起来颇为费力,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从名烟局长周久耕到名表局长杨德才,从“香艳视频”主角雷政富到履职不满4个月的“短命市长”王术君,越来越多的贪官正是被网络举报拉下马。另据广东省纪委此前就政协网络反腐提案

所作答复披露的信息:2010年以来,广东省纪委共搜集5891条网络反腐信息,经查反映属实的685条,立案160宗,给予党政纪处分179人。由此可见,网络反腐已成纪检机关的“前哨”和“千里眼”“顺风耳”,成为制度反腐的重要补充。

翻看古往今来反腐史,每一页都写满了惊心动魄。秒杀贪官的网络反腐,更是将这种惊心动魄演绎到了极致。在举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贪腐案中,微博举报者罗昌平就有这种感觉:作为一个公民,他面对的是手握权力、拥有复杂人脉关系和公共资源的贪官,其力量之不对称、能量之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在漫

长的博弈中,举报者也有困惑、迷茫甚至是恐惧,然而网络反腐的好处在于,随着举报成为公共事件,这决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了无数网民的跟帖、灌水、拍砖,有了无数素不相识者默默提供法律支持和资料链接事实补充,举报者才拥有了源源不断的支持力量。

从刘铁男、雷政富到王术君,贪官“见光即死”的铁律,以及反腐机关闪电般的跟进速度和雷霆万钧的查处力度,都在极大地提振公众关于网络反腐的信心。因此,通过完善的顶层设计和制度整合,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为网络反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使制度反腐因网络化提速而进入2.0时代。